

王肖成
同濟大學社會學系

看见台北

我对台湾一直以来都有着很强的情愫。

小时候爷爷奶奶和外婆便告诉我，我们家在解放后两边都有不少亲友去了台湾，为此十年浩劫期间家里人遭了不少罪；改革开放之初家里正是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台湾的亲友被家里人视作救星，记得台北的舅爷爷曾在 80 年代初给爷爷寄过 500 美金，而这笔钱在爷爷走后仍原封不动的放在当初的那个牛皮纸信封里头。

后来上了小学，课本有日月潭、阿里山的图片，课文里头写到“美丽富饶的台湾宝岛”；再大一点每天中午饭点都和家人一起看 CCTV-4 的《海峡两岸》，虽然身边大部分人都觉得台湾的政局很荒谬选举很荒诞（特别是三一九枪击案后），但我仍觉得那里是华人社会的发达地区，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社会土壤，孕育着我们所没有的自由和希望。

我对台湾，大抵怀着这样一种敬畏和向往。

初到台北，这里的人和物无一不在印证着我对台湾的憧憬：这里的人们很友善、道路不拥挤、路上没有垃圾、公共设施充满了贴心的细节……初来乍到，每天都有一大堆问题问给素不相识的路人，他们每一个人都不紧不慢地细细指点，从没有人会表露出戒备或者不耐烦。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1927《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以我一直觉得，大陆那些成长与六七十年代的中年人，他们的身上有着接二连三政治运动内化于心的戾气和粗鄙，处处体现着与传统的断裂——在他们那个年代，知识和教养被粗暴矮化了。反观台湾，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那样雅致、那样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在台北的日子逐步进入正轨，当我慢慢融入这座都市的日常生活中时，她那浮于表层缭绕着的诱人的玫瑰色开始渐渐散去。台北并没有想象中繁华，这里没有陆家嘴那样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只有 101 兀自伫立；交通没有想象中便捷，离政大最近的捷运站也要先乘公车过去，很多公车一等就是十几分钟；生活也没有想象中的便利：在上海我们早已习惯出门不带现金，校门口卖杂粮饼的大叔也会在摊位上贴上自己支付宝账户和微信账户的二维码，而在台北，出门兜里一定

得揣着一叠钞票……然而这一切一点也不能减损我对台北的热爱：相比较上海快节奏的生活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我更喜欢台北的安逸和无处不在的人情味儿。

然而这好像也正是台湾的学者和精英们所担忧的。在政大的时候老师常说台湾的经济是停滞的、是没有生气的，台湾的年轻人是安于现状的，安于追求自己的小确幸。我对台湾的年轻人不甚了解，就我所身处的大陆年轻人而言，他们整天忙忙碌碌，对未来有很多想法，他们焦虑却乐观，谨慎却无畏。想起去年和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 John LOGAN 聊天时，LOGAN 说道：“你们中国人其实和我们美国人挺像的，极其进取、有野心，却比我们更努力，全世界再找不出一个像你们这样的民族了。”我想，这样的描述也适用于台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吧：他们经历了日治时期、戒严时期到民主时期的演变，创造了台湾的经济腾飞，他们隐忍、坚毅，肩负家国的重担，怀抱对未来的憧憬——不知道他们又是否在大陆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回到上海已经一周了，幡然回首，在台北的日子幸福的像一个不愿醒来的梦。我爱台北，那里处处是温暖的人和事，处处是生活的细节，还有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以及一帮子来自五湖四海两岸三地风华正茂的青年人。

感谢陈老师陪伴我们在台北度过的每一天，不论酷暑或骤雨，您总是在我们身旁，和我们谈心，为我们排忧解难；记得阳明山那天我们几个同学在山上迷了路，您一个人冒着微雨走过漫长的山路来寻我们，回去的路上还拍下了那幅惜别晚会上轰动一时的“阳明山有情天”；感谢每一位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让我有幸收获很多新的视角和思考，常常会有醍醐灌顶之感；感谢每一个为了我们工作到深夜的湾湾的工作人员，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太多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所没有的坚忍和勤俭；感谢每一个在台北对我们施以温暖的人。

王肖成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

2016年7月29日晚于上海